



神台下的传统

李敖

人民文学出版社



独白下的传统

(台湾) 李 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李 昕
封面设计：古 干

独白下的传统

Dubai Xia De Chuant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856×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7}{8}$ 插页 2

1989年 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 5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82,001—94,790

ISBN 7-02-000888-7/I·889 定价 4.15 元

编辑说明

李敖是台湾著名的学者、政论家和作家。原籍山东，1935年生于哈尔滨，幼时曾在北京读书。1949年随家人赴台，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李敖读书破万卷，精通文史，学贯古今，著述甚丰，迄今已达百余种。其作品因反传统、反封建、反暴政，抨击社会时弊，在台湾屡遭查禁，本人也先后两次入狱。

李敖的著作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笔锋犀利，语言生动，文字明快晓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成名作《传统下的独白》于1963年在台湾出版，其代表作《独白下的传统》成书于16年之后。两书皆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剖析中国民族心态的弱点，题旨相近，思想观点一脉相承，道人之未道，成一家之言。其中某些论点虽不免激烈偏颇，但对读者仍不乏有益的启迪。因此，本社从两书中精选与传统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二十五篇，合为一册，定名为《独白下的传统》，以取其居高临下、俯瞰文化传统之意。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既要突出本书的专题性和系统性，又要不拆散原书的基本结构框架的原则，将全书分作两辑，分别选录这两部著作。但为照顾论题的需要，我们把《独白下的传统》作为第一辑。编辑时，除删去了部分与论题无关的文章之外，

尽可能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对书中文字原则上未作改动，以尊重李敖先生原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第一辑 独白下的传统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3
直笔——“乱臣贼子惧”	16
避讳——“非常不敢说”	24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32
传令——全国大跑马	40
新闻——报纸象杂志	48
征兆——来头可不小	56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63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71
音乐——华夷交响乐	80
家族——人越多越好	88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96
欢喜佛	104
中国民族“性”	109
鼓声冬冬的中国之音	119
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	129

第二辑 传统下的独白

独身者的独白	139
爱情的刽子手	141
一封神气的情书	146
假如我是女人	152
张飞的眼睛	160
中国小姐论	169
由一丝不挂说起	175
老年人和棒子	184
十三年和十二月	199

第一辑

独白下的传统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越累积越多，就越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二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一——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核，洋鬼子四核；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二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锤》《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越画越象，所以这个“象”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



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

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当象再回来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授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土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

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来看去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平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型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

表达法，没有象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

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得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

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仁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珪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

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仁宗不是爸爸，而濮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一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丸案”，熹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错认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殄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七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埏，早就为这种现象作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